



印尼汉语学习者 语法偏误研究

张林林 / 著



科学出版社

华南师范大学 201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印尼汉语学习者语法偏误研究

张林林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语法偏误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语法教学的实践,而且对中介语的研究也能提供借鉴,对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本书以同一国家、同一语言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对象,以中介语和偏误分析为理论基础,运用描写、对比分析等方法系统地考察了印尼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法偏误现象,并对这些偏误现象从汉语本体、汉语习得、汉语教学、偏误分析和认知等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尼汉语学习者语法偏误研究 / 张林林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03-043780-8

I. ①印…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039 号

责任编辑: 常春娥 / 责任校对: 蒋 萍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联系电话: 010-6401 9007 电子邮箱: changchune@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3/4

字数: 230 000

定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我一直想坐下来做一个“国别体”的语法偏误分析工作。2011年广东省海外联谊会和华南师范大学派我去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棉兰市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支教三年。这次支教给了我践行这一想法的机会。

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有关资料介绍,其有100多个民族,其中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在印尼,学习汉语的有华裔的,也有其他族群的。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我初步的考察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会出现不同的语际干扰,生成的语法偏误也不一样。全面考察印尼各类汉语学习者的语法偏误现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因此,我把考察对象限定为印尼的华裔,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尼汉语学习者的主体也是华裔,书名也就径直叫做《印尼汉语学习者语法偏误研究》。

偏误类文章的写法好像一般都是先给偏误分类,再找错误原因,最后提出教学建议或对策。分析偏误时一般是给出正确的就可以了,重点放在为什么错上面。我写这本书与惯常的套路有一点不同,既想把错误现象描写分析清楚,又想说清楚规范用法应该是怎样的,两方面都想说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存在决定意识。笔者在印尼一所外语学院华文系工作了三年,周围的印尼同行们时常跟笔者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语法错误,他们更想知道为什么那样说才是符合汉语规范的。这本书基本上是我在印尼教学之余写成的,我认为它的基本读者应该是印尼的汉语教师和印尼汉语学习者,以及国内研究对外汉语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这样写算是应了读者的要求。

为了讲清楚为什么这样说才是规范的,我在分析偏误实例时会多做一些分析和解释,尽可能从句法、语义、语用及认知的角度去解释。我心里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在分析和解释中肯定会有没说清楚或说不清楚的现象,有些分析、解释甚至不是那么确切,并且还有“掉书袋”之嫌。但笔者觉得这样写似乎对印尼的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教师更实用一些,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印尼华族的语言状况	1
第二节 华族语言状况变化的原因	3
第三节 偏误研究	5
第四节 印尼汉语学习者语法偏误的主要特征	19
第五节 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样本和语料来源	21
第二章 能愿动词的偏误分析	23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能愿动词	23
第二节 汉语能愿动词的义项与印尼语相关词语的对应状态	28
第三节 能愿动词的偏误类型	30
第四节 能愿动词偏误原因的解释	37
第三章 趋向动词的偏误分析	45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趋向动词	45
第二节 趋向动词习得的基本情况	47
第三节 趋向动词的偏误类型	49
第四节 趋向动词偏误原因的解释	58
第四章 离合动词的偏误分析	64
第一节 现代汉语中的离合动词	64
第二节 离合动词的偏误类型	68
第三节 离合动词习得过程的特征	72
第四节 离合动词偏误原因的解释	78
第五章 指别、称代类指示代词的偏误分析	82
第一节 指别、称代类指示代词	82
第二节 指别、称代类指示代词的偏误类型	83
第三节 指别、称代类指示代词偏误原因的解释	88
第六章 量词的偏误分析	94

第一节 汉语的量词与印尼语的量词	94
第二节 量词的偏误类型	100
第三节 量词的偏误原因的解釋	117
第七章 否定副词的偏误分析	128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	128
第二节 否定副词偏误的基本情况	129
第三节 否定副词的偏误类型	131
第四节 否定副词偏误原因的解釋	141
第八章 “把”字句的偏误分析	150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把”字句	150
第二节 习得“把”字句的基本情况	151
第三节 “把”字句的偏误类型	152
第四节 “把”字句偏误原因的解釋	163
第九章 “被”字句的偏误分析	171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被”字句	171
第二节 “被”字句习得的基本情况	173
第三节 “被”字句的偏误类型	175
第四节 “被”字句偏误原因的解釋	181
第十章 存现句的偏误分析	190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存现句	190
第二节 存现句习得的基本情况	191
第三节 存现句的偏误类型	195
第四节 存现句偏误原因的解釋	201
第十一章 “比”字句的偏误分析	206
第一节 现代汉语中的“比”字句	206
第二节 “比”字句习得的基本情况	208
第三节 “比”字句偏误的类型	209
第四节 “比”字句偏误原因的解釋	215
参考文献	222
附录	225
后记	227

绪 论

第一节 印尼华族的语言状况

印尼位于亚洲东南,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17 500 多个大小岛屿镶嵌在赤道的两旁。人口约 2.1 亿,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爪哇族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巽他族约占 14%,马都拉族约占 7.5%,马来族也约占 7.5%,华族约 10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5%,排在第五位。(黄昆章 2005)

据有关资料介绍,印尼的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据统计有 200 多种。印尼的官方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简称“印尼语”)。印尼语是在通用于廖内群岛、柔佛和马六甲海峡地区马来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属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从语言类型上看属于黏着语。印尼语有 9 个元音,其中单元音 6 个,复合元音 3 个;辅音 25 个。印尼语的词缀十分丰富,词缀和重叠这两种形式有着很强的构词和构形能力,是两种重要的语法手段。附加成分有前加、中加和后加三类。名词、代词没有表示性、格的语法范畴,名词有普通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方位名词之分;代词有人称和数的范畴,第一人称代词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形容词有同等级、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区分。动词有时、体、态、式的语法范畴。句子成分排列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一般在中心语之后,语序随着谓词性质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化。被动语态的句型较多。(黄昆章 2005)

从语言谱系的角度看,印尼语与马来语实为同一种语言,之所以称为马来语和印尼语应该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国家的官方语言;二是马来西亚人讲的马来语与印尼人讲的印尼语确实存在一些差别,虽然这种差别从语言学上看只是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地域变体,但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中国南方沿海的居民漂洋过海移居印尼。从移居的过程来看,印尼的华族是渐次移居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族群,他们散居在印尼各地。他们移居的时间有先后,出发地(祖籍地)不同,他们在印尼的落脚地也有所不同。(黄

昆章 2005) 这些不同对他们及他们后代的生活方式、语言状况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20 世纪前, 印尼的华族一般以祖籍地为据, 分为所谓的福建帮、潮汕帮、客家帮、广府帮和海南帮等不同的群落。(黄昆章 2005) 隶属不同祖籍帮的华人一般都以祖籍地方言为家庭用语和社团、族群内部的用语。福建帮在祖籍帮中人数最多, 移居到印尼的时间也相对长些, 多生活在雅加达、泗水、棉兰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久而久之, 福建帮的生存方式影响在印尼生活的其他华裔族群(简称“华族”), 闽南话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功能也在不断扩大, 它不仅是福建帮群的家庭、帮群内部用语, 而且逐步取得了不同帮群、不同地域、不同社团之间通用语的地位。

从总体上来看, 20 世纪印尼华人的语言状况与华文教育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将印尼华族的语言状况分三个时间段来考察。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初到 1965 年的 9 月 30 日, “九三〇”事件作为这个时期的终结点。20 世纪上半叶, 印尼华裔族群内部掀起了一个泛华运动, 这个运动主要是针对前一个时期, 华裔族群内部以祖籍地为藩篱, 各自为政的现象, 华人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儒学改造华人社会”的口号, 通过兴办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华校来普及中华文化, 提高华人的民族意识, 促进华人的内部团结。在这样的民族意识催促下, 华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有关资料统计, 截至 1957 年, 印尼的华文学校达到 1669 所, 在校学生多达 45 万人, 仅雅加达就有 45 所。(黄昆章 2005) 华校的普及使得当时适龄的华族青年能够进入华校学习, 他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 同时也基本学会了华语。

华语在华人族群中的普及, 增强了华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客观上也抑制了闽南话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同祖籍地华人社团之间通用语的势头。这个时期, 华人族群中的中青年, 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华人中青年, 基本上是双语者。他们多数掌握了三种语言: 祖籍地方言, 如闽南话、潮汕话、广府话、客家话等, 主要用于家庭, 或作为较小范围、人员较为单纯的华人社团的内部交际用语; 华语主要用于不同祖籍地华人之间的交流; 印尼语主要用于社交和工作场合。从正式程度和熟练程度这两个维度看, 这三种语言呈以下不同的连续统状态:

正式程度: 印尼语 > 华语 > 祖籍地方言

熟练程度: 祖籍地方言 > 印尼语 > 华语

第二个阶段从 1965 年的“九三〇”事件后到 1998 年的印尼改革开放前。1965 年的“九三〇”事件使得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华人机构团体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所有以华语为教学语言、为教学内容的华校都被取缔, 致使近 30 万学生失学。此后 32 年, 教授华文被视为非法, 华文出版物同毒品等一道被禁绝。印尼的华人开始进入一个长达 32 年的被强制同化的时期。这种强制同化在语言政策上表现为不准教华语, 不准说华语, 不准写华文。“九三〇”事件在语言使用上的直接后果是华人族群中出现了新的华文盲群体。这些新华文盲的年龄现在一般在 50 岁以下, 他们的语言状况出现

了新的变化。虽然他们仍然是双语人群,但他们所掌握的是祖籍地方言(不包括闽南话)、闽南话和印尼语。这三种交际工具的功能域较之他们前辈使用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祖籍地方言仍然是用于家庭,或较小范围、人员较为单纯的华人社团内部;闽南话的功能域又有所恢复,作为不同华人族群或社团的通用语;印尼语,不仅作为华人的社交、工作用语,有时还充当着不同华人社团或人群的交际用语,即原来华语所承担的部分功能角色已由印尼语取而代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半个世纪的泛华运动的全部成果付诸东流。

第三个阶段以 1998 年印尼的改革开放为发端,1998 年印尼的改革开放对华文教育来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个新纪元的真正到来是在 2001 年。2001 年 2 月,印尼政府取消了禁止进口、发行、买卖中文印刷品的法令;印尼教育部青年、体育和校外教育司与中国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广东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广州签订了合作举办华文教师培训班的协议。2001 年 5 月 12 日印尼教育部和中国教育部在雅加达签署了在印尼举办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协议书。印尼政府已经把华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其作为初中、高中的外语选修课。(郭熙 2007)

进入 21 世纪后,华文教育重新起步,并且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华文教育的再度兴起和繁荣使得印尼华族的语言状况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华人族群的语言状况与以往有所不同。华人在此之前的语言状况基本是以祖籍地和居住地为类型特征的。具体来说,就是同一祖籍地华人的语言状况大致相同,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华人的语言状况也大致相同。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单一因素决定语言状况的情况有所改变,祖籍地的决定性地位在下降,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着华人的语言状况。总之,这种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导致这种多元化的原因有语言本身的,也有社会的;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有年龄上的差异,也有地域上的差异,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第二节 华族语言状况变化的原因

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认为华族语言状况变化的原因有二。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诸于祖籍地这样的社会活动纽带,无论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都是不自足的,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突破原先的交际范围,交际范围的突破也就必然带来交际工具的更新,华人的言语交际活动、交际对象的范围在扩大,再也不是局限在族群内部了。

其次,32 年的强制同化,对华人族群来说,有三个具体的效果:一是限制了华文普及和华文教育的发展;二是强化了闽南话作为不同祖籍地华人族群间的交际工具的地位;三是有助于普及印尼语,客观上使得华人的印尼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华族作为双语的言语社团,其双语类型以及双语的功能域都发生了变化。“九三〇”事

件之前, 华文教育的普及, 使得现在年纪在 60 岁以上的华人基本上掌握四种语言交际工具, 即祖籍地方言、闽南话、印尼语和华语。年纪在 30 岁~60 岁的华人基本没有接受过华文教育, 他们的语言状况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两点不同, 一是基本不会华语, 二是祖籍地方言不是很熟练。年纪在 30 岁以下的华族青年与他们的祖父辈、父辈相比又有所不同,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已经不会祖籍地方言,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讲闽南话, 但福建并不是他们的祖籍地, 闽南话只是作为华人族群内部的通用语; 另一个不同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华语。

笔者认为, 祖籍地方言的掌握情况与对祖籍地观念的认同有一种正相关关系。笔者曾对 30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的华人进行过访谈式的调查, 调查结果请见表 1.1 和表 1.2。

表 1.1 印尼不同年龄段华人对祖籍地的了解情况

年龄段	人数	是否知道所属省		是否知道所属市		是否知道所属县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60 岁以上	37	37	—	37	—	37	—
30 岁以下	65	52	13	38	27	14	51

表 1.2 印尼不同年龄段华人对祖籍地方言的掌握情况^①

掌握情况	年龄段	人数	百分比 / %
熟练	60 岁以上	23	100
	30 岁以下	9	23.7
简单交流	60 岁以上	—	—
	30 岁以下	13	34.2
不会	60 岁以上	—	—
	30 岁以下	16	42.1

以上从年龄分布的角度对华人族群的语言状况进行了描写, 这种描写只是初步的, 还有好几个变量因素对华人的语言面貌产生着影响, 如城市国际化程度、华人的数量等。

根据笔者的考察, 在印尼, 华族基本生活在城市, 城市规模上的差异会影响到华族的语言状况。生活在小城镇的华人, 其祖籍地方言保持得相对较好, 尽管他们也会讲福建话, 但他们只是在不同祖籍地的华人彼此交流时才用, 一般多使用祖籍地方言。

①这里祖籍地方言具体指的是在印尼华人族群中通常所指的客家话、潮汕话、广府话、海南话。潮汕话、海南话从方言的角度讲, 是闽方言的次方言, 但在印尼的闽南话(即印尼华人所称的福建话)实际已经成为不同祖籍地华人社团之间的通用语, 所以祖籍地为福建且操闽南话的不在表 1.2 的统计之列。

而生活在大中城市(如棉兰、先达)的华人青年,他们使用的语言主要是福建话和印尼语,祖籍地方言和华语或是不会,或是不熟练。首都雅加达的情况是这一现状的典型代表。雅加达的华族青年现在多数只会印尼语,祖籍地方言、福建话和华语基本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城市的规模与经济发展、城市的对外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越大,发展经济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比如劳动力、技术力量的储备量就越大;经济相对发达,由于经济活动本身的要求,对外联系也会多一些。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官方语言印尼语肯定会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这只无形的大手”在影响语言状况发展变化走向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趋势。

第三节 偏 误 研 究

一、偏误概念

人们学习第二语言,尤其是成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错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系统前错误,所谓系统前错误是指学习者还没有学到这类知识或规则,在运用第二语言交际时要用到,但用错了。第二类是系统错误,所谓系统错误是指已经学过,但学习者掌握不好,没有准确地理解或者张冠李戴,在运用时出现的错误。第三类是系统后错误,所谓系统后错误是指学习者学过并且理解掌握得较好,但就是在运用时由于各种原因,如临时性的遗忘等原因用错了。

二语学习者在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时所出现的错误,被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这类错误一般被称为偏误,是指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类错误中的第二类错误,其他的错误,一般被称为失误。

失误与偏误是有区别的。失误是由于从未接触过或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偏误是由语言能力的缺失造成的。“区别二者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出现频率的高低。偶尔出现,可能是失误;出现较多,可能是偏误。二是生成者能否自己纠正。可以自纠的是失误,不能自纠的是偏误。”(周小兵 2009: 87)

从二语学习的角度看,偏误是一种中介语现象,“指的是中介语与目的语规律之间的差距”(鲁健骥 1984)。

“中介语”这一概念是由 Corder、Selinker 等人提出并不断完善的。Corder(1967)认为,第二语言(简称“二语”)的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有些错误是非系统的,是由于某种偶然因素,如遗忘等原因产生的,这种错误并不反映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偏误是系统性的,它是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反映,它反映了学习者对目的语规则的认识和掌握情况,这种掌握是动态的,是母语的影响和对目的语规则

的认识与掌握此消彼长的过程。为此, Corder 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者过渡能力系统和过渡方言概念。

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系统是一个不断努力接近目的语的近似系统。这个近似系统有它自身的内在结构, 这个内在的结构系统既不同于目的语的结构系统, 也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结构系统。这个结构系统不是零散的、一些“乌合之众”的聚合体, 而是系统的、有规律的模式。同时, 这个近似系统是动态的, 它随着学习的进展不断地向目的语规则系统靠近, 近似系统内部构成成分的比重也在随之发生改变。此外, 每一个二语学习者的近似系统都是一个个体, 但是, 母语背景相同、所处学习阶段大致相同的学习者的近似系统有着较强的趋同性。换言之, 近似系统虽然往往是以偏误的形式出现的, 但它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中介语’的术语最早由 Selinker 于 1969 年提出(1972 年正式发表), 用来指称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构建的既不同于母语, 又不同于目的语的一种语言知识系统, 是逐步接近目的语的发展阶段。”(周小兵 2009: 16)

Selinker 还提出了“石化”(fossilization)概念, 也就是所谓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僵化现象, 试图解释多数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虽经努力学习但仍然不能达到与母语大致相当水平的深层原因。他认为, 二语学习者获得语言能力的习得机制与母语习得的机制完全不同。学习第二语言时, 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往往已过, 习得机制已经退化, 所以会出现僵化现象, 语言能力的发展会出现停滞状态。(白凤欣 2007)

通俗地说, 中介语从大的方面来看是由两个部分构成: 一个是与目的语一致的部分, 另一个是与目的语不一致的部分。前者一致的部分, 相对而言是单纯的, 后者不一致的部分, 有可能是多层级的。如以印尼棉兰华族的汉语学习者为例, 从导致不一致的原因角度看, 它们中的有些不一致是受母语闽南话的负迁移影响, 而另有一些不一致则是受印尼语的影响所致。

不同母语背景、不同学习环境、不同学习阶段的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是各不相同的, 但它们仍有一些共性特征:

一是系统性。这种系统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层意思是, 中介语由与目的语一致和不一致两部分构成, 虽然其中一个部分是以错误形式呈现出来的, 但这两个部分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互补性很强。另一层意思是, 虽然与目的语不一致的部分是一种错误, 但这种错误的每一个具体形式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系统性的错误, 一致与不一致的此消彼长也是以系统变化的形式进行的。

二是变化性。中介语是一个动态系统, 这种变化性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层含义是随着学习者的学习进展, 中介语中的一致与不一致的构成会发生变化。总的来说, 一致的部分会逐渐增多, 不一致的部分会逐渐减少。当然, 也可能发生退化或僵化现象。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个体的中介语, 尽管母语背景相同, 也会存在程度上的

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体现在对各个语言要素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上。这种个体间的差异和阶段性的差异从本质上说都是由中介语所具有的可变性造成的。

二、语法偏误的类型

给事物进行分类或是为了解释的方便,或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或是其他的目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分出来的类有时可能是一个多层级的系统。我们下面给语法偏误进行分类,会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来分类,目的是使我们对语法偏误这种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从形式特征的角度分出的语法偏误

这种分类方式着眼于偏误的形式特征,不考虑造成偏误的原因,把偏误与正确形式进行对比,找出偏误在何处。这种分类方式的好处是便于描写,比较直观。教学中,用这种分类的结果来指出并纠正学生的偏误,通俗易懂,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本书下面各章对偏误的描写多数是采用这种分类方式。

语法偏误的形式类型一般分为五种。

1. 误加

误加(addition error)也叫“添加”,指在语句中多了不应该有的词语(周小兵2007)。例如:

[1-1]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正:我只想和你在一起。)^①

[1-2] *但她是一个又善良又有讲道理的老师。(正:但她是一个又善良又讲道理的老师。)

[1-3]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吗?(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例[1-1]误加了“要”。汉语普通话的能愿动词“想”“要”都是表示意愿的,“想”表示愿望、打算,“要”表示有做某事的意愿,表示的是一种意志,在语义上比“想”强。根据原句的意思只需使用其中一个即可,但原句能愿动词前有一个“只”,“只要”是表示条件关系的关联词,其后还应该有一个分句,因此,只能保留“想”。例[1-2]误加了“有”。汉语普通话中表示已然动作的动词肯定式前不加“有”。例[1-3]误加了表示是非问的疑问语气词“吗”。汉语普通话的疑问信息主要靠以下三种手段表达。

(1)特殊词语。如用疑问代词构成特指问,“你在吃什么?”;用表疑问的语气助词“吗”

①例句前标“*”号表示这种说法不成立。例句前标“?”号表示这种说法一般不成立,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可能成立。括号里的句子是修改后可接受的说法。

构成是非问,“你在吃饭吗?”;用“呢”构成不含疑问代词的特指问,“我的手机呢?”。

(2)特定的句法结构。如“V不V”结构,例如“你去不去雅加达?”

(3)疑问语调。例如:“他走了?”

疑问语调可以与其他两种手段同现,而特定词语与特定句法结构一般是互斥的。因此,例[1-3]句末有了表疑问的语气助词“吗”,句中又有“V不V”结构,二者只能选其一。

2. 遗漏

所谓遗漏(omission error)是指句中缺少了应有的语法项目(周小兵 2007)。例如:

[1-4] *这个小礼堂能够 300 个人。(正:这个小礼堂能够坐 300 个人。)

[1-5] *能够管理和文秘两种工作。(正:能够从事管理和文秘两种工作。)

[1-6] *你一定要我的生日宴会。(正: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汉语的能愿动词为谓宾动词,以上三例都是能愿动词后缺少动词宾语。

3. 错序

错序(sequential error)也有学者称为“错位”,指语法项目的排列顺序有误(周小兵 2007)。例如:

[1-7] *晚上不应该吃东西太多了。(正:晚上不应该吃太多东西。)

[1-8] *这是我坐飞机的第一次,也是我和朋友出国的第一次。(正: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和朋友第一次出国。)

[1-9] *我们三月十二日二零零一年去马来西亚。我们七点早上到了马来西亚。(正:我们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去马来西亚。我们早上七点到了马来西亚。)

例[1-7]的“太多”应该在“东西”之前,汉语普通话表示事物数量的修饰语一般放在名词的前面。例[1-8]的两个表动量的“第一次”应该放在动词前作状语。例[1-9]中时间表达顺序是先年再月日、先时段再时点。

4. 误代

误代(substitution)也有学者称之为“替代”,是指不恰当地使用了某个语法项目,张冠李戴(周小兵 2007)。例如:

[1-10] *明天我可能没来上课。(正:明天我可能不来上课。)

[1-11] *无论是被父亲逼来学习的,但是看了亚院的情况,让我想在这里学习也不错。(正:虽然是被父亲逼来学习的,但是看了亚院的情况,我想能

在这里学习也不错。)

- [1-12] *我有很多朋友,我对朋友的关系都很好。(正:我有很多朋友,我跟朋友的关系都很好。)

汉语的否定副词“没”否定有界动作,“不”否定无界动作,例[1-10]的“来上课”是无界动作。例[1-11]应该用“虽然”来表示让步转折关系。例[1-12]的“对”应该改为“与/跟/和”。汉语普通话的介词“对”由动词演变而来,仍然保留着“对待”“对付”的意思;介词“与/跟/和”用于由A、B两方面一主一次参与的动作行为的句子,介词“与/跟/和”引介出次要的一方。

5. 杂糅

杂糅(mix-up-error)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法结构不恰当地放在同一个句法结构里(周小兵 2007)。例如:

- [1-13] *你一定要学会也能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正:你一定要学会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也能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 [1-14] *我把我做的那张生日卡送给了阿明一张。(正:我把我做的那张生日卡送给了阿明。/我送给了阿明一张我做的生日卡。)
- [1-15] *他不比他弟弟一样高。(正:他没他弟弟高。)

(二) 因不同原因产生的语法偏误

从偏误产生的原因来看,我们可以将印尼汉语学习者的语法偏误分为以下五种。

1. 语际干扰引起的语法偏误

语际偏误是指由母语的负迁移引起的偏误,也称“干扰性偏误”“对比性偏误”。如印尼语中修饰成分多数情况是后置的,受印尼语“Aku berbahasa mandarin di rumah”的干扰,棉兰的初级汉语学习者可能会说“我说汉语在家里”。

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印尼汉语学习者出现的语际类的语法偏误从总体上来看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几种句法格式和功能词的使用上,而且与能力水平直接相关,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语际干扰的因素在减弱。请见表1.3。

表 1.3 印尼棉兰各类汉语学习者语法干扰偏误比率

水平	学习者类型		偏误比率/%
	年龄	母语	
初级	儿童	闽南话	8
	青少年	闽南话	27
	成人	印尼语	57

续表

水平	学习者类型		偏误比率/%
	年龄	母语	
高级	成人	闽南话	10
	成人	印尼语	30
	青少年	闽南话	12

印尼汉语学习者的语际偏误较为复杂,有多种因素会对这一结果产生影响。比如,母语背景的不同会影响到这类语法偏误的比率,如表 1.3 所示,母语为闽南话的,其偏误比率大大低于母语为印尼语的友族汉语学习者。由这一因素而引起的差异较为容易理解。印尼语与汉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印尼语是黏着语,有些实词,如动词等,有词形变化,添加词缀是表达句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汉语是孤立语,实词除动词、形容词、量词中有一部分可以重叠外,没有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闽南话虽然是汉语的一种地域变体,但印尼的闽南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语言接触,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从总体上来看,主要体现在一般词汇和语义上,语音和语法上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足以影响到改变闽南话的基本面貌,闽南话与汉语普通话在语法上和句法格式上的差异并不大。因此,如果把印尼华族母语闽南话与汉语普通话视为之间具有语际差异,那么华族的汉语学习者在多数情况下产生正迁移,而印尼友族的汉语学习者,其母语是印尼语,如果发生语际干扰,出现负迁移的可能性要大大高于华族的汉语学习者。

年龄因素也会影响到偏误比率的高低。年龄与语言能力具有相关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对母语和第二语言来说,这种相关性却有着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母语与年龄是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语言能力越强;但对第二语言来说,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年龄越大,学习第二语言越困难,尤其是已经过了临界期的学习者。同时,由于年长者母语的知识系统掌握得比较牢固,印尼语也说得较为流利,因此,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目的语与母语或印尼语进行对照比较,以从中找到学习的捷径,出现的偏误也就可能会多些。年纪小者,尤其是还未过学习语言临界期的儿童,学习第二语言主要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模仿运用,加之他们对母语知识规则系统还没有自觉的认识,他们的语际干扰性偏误反而出现频率要低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学习策略选择上的差异。

此外,在印尼,汉语学习者语际干扰造成的语法偏误有地域上的差异。在一些华族较为集中、华夏文化保留较为充分、汉语教学较为普遍的地区,如先达、棉兰、廖岛等地的汉语学习者受印尼语干扰发生的语法偏误,较之首都雅加达的华族汉语学习者出现的同类语法偏误的比率要低得多。究其原因,因为雅加达是首都,国际化的进

程高于其他地区,影响也远远大于其他地区。该地区的华族青年基本上都不会闽南话,它们的母语就是印尼语,华族子女多数是从中学阶段开始学习汉语,他们的语际干扰一般是来自印尼语。而先达、棉兰等地的华族汉语学习者的母语实际上是闽南话,他们自幼习得闽南话,许多华族家庭从小学阶段就督促孩子学习汉语,这些华族子弟的汉语和印尼语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他们身上出现的语法偏误既有来自印尼语的干扰,又有来自闽南话的干扰。受印尼语的干扰出现的语法偏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语序和功能词的运用上;而受闽南话的干扰出现的语法偏误,更多地表现在由于对词义理解的偏差而导致的词语搭配上。

2. 语内因素引起的语法偏误

语内因素引起的语法偏误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偏误,指学习者依据从目的语某类语法现象归纳概括出来的不全面的规则进行类推而产生的偏误,所以又称“目标语规则泛化偏误”“发展性偏误”。比如,学习者了解了“故障”这个名词多用于书面语,一般可以与口语词“毛病”“问题”替换,所以可以有以下组合,但也类推出了以下一些错误的组合:

出了故障	出了问题	出了毛病
一般故障	一般问题	一般毛病
人为的故障	*人为的问题	*人为的毛病
排除了故障	*排除了问题	*排除了毛病

一般认为,语内偏误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学习的初级阶段比较容易发生语际偏误,语内偏误发生的概率低于语际偏误,到了学习的高级阶段,语内偏误的概率要高于语际偏误。印尼汉语学习者的情况大抵如是。

语内偏误如果从学习心理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其具体呈现出来的类型特征,还是偏误产生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策略的一种衍生物。

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是语内偏误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概括是通过个别推知一般,总结出规则的一种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人类学习时常用的一种策略,人们学习语言时也不例外(Brown 1980)。它是学习者在语言处理(听与说)的心理过程中对语言施加影响所带来的结果。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是先接触一般性规则,掌握了这些一般性规则之后,自觉或不自觉会出现过度使用这些规则的情况,从而导致过度概括类错误出现。这类偏误在语法、语义层面出现得相对多些,在不同等级水平学习者身上都会有所体现,而且接触的语法、语义规则越多,这类过度概括的现象就越多。比如,汉语中含介词“把”字结构的祈使句在许多情况下,介词“把”可以不出现的。例如:

[1-16] 把鞋子脱掉! → 鞋子脱掉!